

台灣社會現象的分析，伊慶春、朱瑞玲主編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25，頁517—549
78年6月，台灣，台北

台灣代間社會流動初探： 流動表的分析*

許嘉猷**

壹、前言：文獻探討

一個社會是開放或閉塞，公平或不公平，通常視此社會如何把既得利益或不利情形傳到下一代而定。在開放社會（open society）裡，人們的成就較不受有利出身背景之庇蔭，也較不受不利的出身背景之限制；反之，在閉塞社會（closed society）裡，父母親則把有利或不利的地位傳到下一代子女身上。社會流動，尤其是代間社會流動，基本上就是在量度個人的出身（origin）與終站（destination）之間的關聯程度。從社會流動的觀點而言，某一社會是開放的社會，或者是閉塞的社會，端視此社會裡，個人的出身與終站的關聯程度之強弱而定。當然，絕對開放或閉塞的社會，終究是少之又少，大部份的社會都是介於兩者之間。

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研究，公認是以美國社會學大師

* 本文承蒙國科會經費補助（計劃編號：NSC-77-0301-H-001-02D），特此致謝。此外，助理陳貞旬幫忙跑電腦資料，陳慧卿幫忙謄寫本文，也一併致謝。

** 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薩羅金(Pitirim A. Sorokin)為奠基者。薩羅金的 1927 年之古典名著『社會與文化流動』(*Social and Cultural Mobility*)一書，對社會流動的概念和現象，詳加探討。此書代表著社會學界對此主題的系統經驗研究之開始。而薩羅金為社會流動所做的分類，即垂直流動(*vertical mobility*)和水平流動(*horizontal mobility*)，已被社會學界所共同接受。水平流動意指個人從某一社會位置轉移到同樣高低的另一個社會位置。垂直流動意指個人從某一社會位置轉移到高低不一樣的另一個位置。因此，它可能是向上流動(*upward mobility*) (薩羅金稱之為 *ascending* 或 *social climbing*)；也可能是向下流動(*downward mobility*) (薩羅金稱之為 *descending* 或 *social sinking*)。

除了定義式的說明社會流動之外，薩羅金還闡述造成社會流動的原因。他把這些原因歸納成三大類，即人口特質，環境之改變，主要為技術變遷，以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天生能力並非一致而造成的社會流動。薩氏對社會流動的理論說明，至今仍被認為歷久彌新，事實上，自薩羅金以來有關社會流動的研究，還是受其影響。

薩羅金對社會流動的經驗研究，引起後來社會學界對社會流動研究之廣泛興趣。因此，自薩氏以後，有關社會流動，尤其是美國社會流動的經驗研究，就相當多。其中，主要的有 S. M. Lipset & Reinhard Bendix 二人合著的『工業國家的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1959), Joseph A. Kahl 的『美國的階級結構』(*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1961), 以及 S. M. Miller 的『比較社會流動』(*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1961)等等。這些人對社會流動的研究，主要是以簡單的統計方法，例如百分比、列聯表的卡方分析等等，去分析描述流動表上職業的傳承與流動情形。但由於他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相當粗淺，基本上仍無法對社會階層理論，特別是關於社會流動現象，加以嚴謹的驗證。這種情形，一直到 Blau & Duncan 二人合著的『美國職業結構』(*The American Occu-*

pational Structure)一書在1967年出版之後,才開始有了極大的改變。他們二位,除了對流動表的深入探討外,還以相當複雜嚴謹的統計方法——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去探討美國人民在教育、職業方面的成就受其社會出身,即其父親的教育與職業的影響有多大? Blau與Duncan的研究,引發了美國社會學界對地位取得研究(*status attainment research*)的廣泛興趣,同時,也奠定了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研究社會流動的基礎。而他們所提出的「地位取得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也成為學者們研究地位取得的基本模型。

由於本研究的重心在流動表的分析,另外,本文作者在其他研究(許嘉猷, 1986)裡,也已對地位取得研究,詳加探討。因此,在此就不再討論地位取得研究。不過,基本上,誠如地位取得研究的創始人之一(*Duncan, 1979:793*)所言,地位取得研究重視的是社會出身(*social origins*)和其他背景特性對職業成就的影響模式;而流動表的分析,重視的是以職業地位的起點(*origin*)和終站(*destination*)之比較,去分析職業世襲和流動的基本型態。前者將職業地位視為有高低尺度的變項,而以迴歸係數估計出身對終站的影響程度,但是它卻無法詳細告訴我們流動型態和個別職業的傳承與流動情形;後者雖可幫助我們分析流動型態和個別職業的傳承與流動情形,但卻無法告訴我們職業傳承的重要機制(*mechanisms*)和過程。因此,二者可說是相輔而成的,而非相互排斥的。

在流動表的經驗研究方面, *Blau & Duncan (1967:23-80)* 從職業的補充與供給(*occupational recruitment and supply*), 階級藩籬(*class boundary*), 以及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的主要層面此三大方向分析美國的社會流動和職業結構的特質。在職業的補充與供給方面,他們的主要發現為美國的職業結構有大量的向上流動現象,而造成此種現象的主要來源之一為居於職業階序上端的職業急速

擴張，以及居於底層的職業之相對大小（size）急速縮小；在階級藩籬上，他們發現美國的職業結構有三大藩籬。此三大藩籬將職業結構分成三大階級，即白領、藍領與農民階級，而且每一藩籬限制代內與代間的向下流動，但是在向上流動的機會有剩餘的話，則准許向上流動；在社會距離的主要層面方面，他們的主要發現為美國人民用以計算職業的起點與終站間的社會距離之最主要層面，乃是以教育和收入所組合而成的社會經濟地位。

在Blau & Duncan的流動表分析之後，由於Goodman（1969，1972）等人的大力提倡，以對數線性模型（loglinear model）分析流動表以及其他列聯表（contingency tables）資料，蔚然而興。例如Hauser等人（1975a，1975b），以1962年的OCG（Occupational Changes in a Generation）資料，以及國家民意研究中心（NORC）從1947年到1972年所得到的四次全國性調查資料，以對數線性模型去分析這些資料。他們發現在這幾十年之間，美國人民的流動機會，基本上並不像大家所認為的更為開放，而是沒有什麼改變，而且影響美國代間流動型態最主要的原因，乃是職業結構的變遷，即美國社會起先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再由工業社會進入以服務業為主的社會。另外，Featherman & Hauser（1978）以1962和1972年的OCG資料加以比較，發現美國的職業流動幅度相當大，而且愈來愈大，但是，仍有相當程度的職業傳承現象；同時，與Blau和Duncan的發現一樣，他們也認為向上流動現象遠高於向下流動。此外，對於造成這些現象的主因，他們也認為是職業結構的變遷，而非社會流動機會的更為開放，即結構性流動（structural mobility），而非循環流動（circulation mobility），才是造成這些現象的主因。

然而，結構性流動與循環流動究竟如何區分？特別是如何以對數線性模型的分析方法，去分析結構性流動與循環流動，至今仍是相當困擾社會流動研究者。理論上，結構性流動指的是社會結構特質的分

佈（通常指的是職業結構）之改變所引起的流動現象，而循環流動指的是流動機會的開放程度。但是，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社會流動研究者經常以差異指數（index of dissimilarity）去測量結構性流動，而以其餘的流動做為循環流動。這種以殘餘項（residual category）做為循環結構的運作定義方式，引起不少人的不滿意（Sobel, 1983），被認為是使循環流動的概念缺乏實質的內容。此外，以對數線性模型的參數（parameters）關係去區分或析離結構性流動與循環流動，至今仍有許多缺陷、困難或限制。因此，Sobel (1983)曾經懷疑是否應該乾脆放棄結構性與循環流動的概念，或者放棄以對數線性模型的分析方法去推估二者的努力，而回到傳統的百分比，卡平方分析的粗淺統計分析。幸而Sobel, Hout, Duncan (1985, 1986) 等人最近的研究，認為以對數線性模式，尤其是對數乘數模式（logmultiplicative model）去定義和析離結構性流動和循環流動的方法，仍然相當可行。因此，不必因噎廢食，以統計技術之不可行而放棄社會學的重要概念。

事實上，結構性流動與循環流動的概念仍然繼續為社會流動研究者所採用。Hout (1988) 最近的研究即是個好的例子。在Featherman & Hauser (1978) 利用1973年的OCG資料分析美國的社會流動之後，Hout則利用美國國家民意研究中心（NORC）在1985年所做的「一般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資料，繼續分析在1972-1985年間，美國社會流動的演進情形，並與前述Blau & Duncan (1967), Featherman & Hauser (1978) 的研究加以比較。Hout的研究結果發現，在這段期間（1972-85），美國的結構性流動比率開始下降，而循環流動則增加，因此，在二者相互抵消之下，總流動率仍然沒什麼改變。同時，向上流動率仍高於向下流動率，但與1960和1970年代相比之下，二者的差距較為縮小。此外，在1972至1985年這段期間，子女的社會經濟出身與終站之間的關聯程度，下降了三分之一左右，其主要原因是大學生佔總勞動力的比例增加，以及

大學生的出身地位與終站之間的關聯程度較低之故。

最後，在國際性的比較方面，Erikson與Goldthorpe（1985）在比較美國、英國與瑞典的社會流動情形後，認為美國的流動機會，比諸於英、瑞二國，並沒有顯得特別高。Partocarero（1983）在比較法國與瑞典的社會流動性(social fluidity) (即流動機會)之後，認為這二國之間的男女兩性之社會流動型態並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其國內的男女兩性之社會流動型態都不相同。另外，Grusky & Hauser（1984）則比較十幾個工業先進國家的社會流動情形，認為這十幾個國家的社會流動和不流動現象，實質上相當類似，而對於彼此間的社會流動之一些差異性，則可以由一些影響社會流動的因素（例如教育、工業化程度等等）加以解釋。

在簡略回顧社會流動的研究之後，接著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國內的研究。台灣近幾十年來快速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社會流動的情形也應相當普遍才對。作家筆下所謂的沒落的王孫貴族，新興的商場新貴，或者是農工社會交替之間的種種眾生相，就是在描述這種情形。但是，社會學家不像作家一樣，可以憑自己的直覺與感受寫出自己的看法，而是必須有資料才行。然而，國內對於二代職業資料的收集，卻相當缺乏和不完全。因此，以流動表的資料去分析台灣整體的代間社會流動情形，至今可說是尚付之闕如。勉強說來，只有蔡淑鈴與文崇一（1985）的性別與社會流動之研究，才是屬於這方面的研究。不過他們所用的職業，只有農工商三類，仍是相當不健全，無法探討社會流動的中心概念，例如向上流動、向下流動等等。事實上，他們的探討重心，也不在此。因此，乃引起了本文的研究動機，嘗試以流動表的資料，去初步探討台灣代間社會流動的一些基本情形，例如整體流動、向上與向下流動、結構性流動與循環流動，以及個別職業的代間流動情形等等，以期能夠對台灣社會的地位傳承與流動現象，有所瞭解。

貳、資料與研究方法

在資料來源方面，主要是取自於主計處的民國75年「台灣地區家庭收支暨個人所得分配調查」資料。本研究從這批資料中，就兒子年齡在二十歲以上，而且父子二代皆就業者抽取出來，然後再剔除掉父子二者的職業是軍人或職業無法分類者，總共得到2672個父子二代資料。

在資料的分析方面，本研究先依照基本的流動表分析方法，即以基本的描述性統計（例如百分比）分析流動表上，流出（outflow）與流入（inflow）各類職業的比例。由於百分比是相當粗糙的指標，而且受起點與終站的邊際分配變異之影響，社會流動研究者乃不斷嘗試建立各種不受邊際分配影響的流動指標，以測量職業傳承與流動的關聯程度。在統計獨立假設之下，以流動表內每個方格子的觀察次數與期待次數之比率做為關聯指標，乃成為最有影響力，而且號稱不受邊際分配影響的指標，例如Rogoff（1953）的「社會流動距離比率」（social distance mobility ratio），或者是Glass（1954）的「關聯指標」（index of association）等等都是。然而，這些關聯指標，並非真的不受流動表上起點與終站的邊際分配之影響。事實上，這些指標都還是把起點與終站的分配之影響與流動或傳承效果混淆了（Featherman & Hauser, 1978: 141-147）。用統計術語來說，即是把行與列效果和互動效果混淆（confound）了。因此，學者們繼續努力發展最佳的關聯指標，其中，較為社會流動研究者所採用的指標和方法有邊際比例調整法（proportional adjustment to marginals）（Deming & Stephan, 1948; Mosteller, 1968），以飽和對數線性模型參數（Parameters of the saturated loglinear model）估計流動比率以及Featherman與Hauser（1978: 147-159）所發展出來的新流動比率（new mobility ratio）。前二者可以降低行與列效果和互動效果

的混淆程度，但還是無法完全避免混淆情形，而新流動比率，據 Featherman與Hauser所言，可以完全避免行與列效果和互動效果的混淆情形，但是須先找出適合的流動型態模型。

本研究基本上乃是初步探索性質，因此，還沒有發展出適合的台灣流動型態模型；另一方面，由於對數線性模型在1970年代逐漸興起之後，對傳統流動表和其他類別資料的分析，起了革命性的改變，故本研究將以飽和對數線性模型參數估計流動表內各方格的流動比率，以探討各類職業的地位傳承與流動之情形。

參、資料分析

欲做職業流動表的分析，須先確定職業的分類和評定它的高低。在職業的分類方面，主計處的「家庭收支暨個人所得分配調查」資料，共分為十二類，即(1)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2)行政及主管人員，(3)監督及佐理人員，(4)買賣工作人員，(5)服務工作者，(6)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7)生產及有關工人，(8)運輸設備操作工，(9)體力工作人員，(10)職業不能分類之工人，(11)現役軍人，(12)無職業家庭。在去掉軍人，職業分類不詳者與無職業者之外，尚有九類。由於生產及有關工人，運輸設備操作工，以及體力工作人員同屬藍領工人，不論在工作性質，職業聲望，平均教育程度上，都相當接近，而且，官方統計資料與學者們（蔡淑鈴，1987）的研究，也是將它們合併為一類，故本研究將三類職業合併成一類，即工人。故本研究對職業的分類，共分為七類，即(1)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2)行政及主管人員，(3)監督及佐理人員，(4)買賣工作人員，(5)服務工作者，(6)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以及(7)工人。

另外，對於職業高低的評定，通常有二種主要方式，即主觀的職業聲望之評定，以及客觀的職業社會經濟地位之評定（Haug, 1977; 許嘉猷，1986）。本研究採用後者的評定方式，其主要的考慮有二點

：一是社會流動研究者，例如Blau & Duncan (1967)，Featherman & Hauser (1978) 等人，都是以客觀的職業社會經濟地位去評定職業之高低階序；另一點則是較符合台灣實際的職業流動情形。由於農民的收入遠低於非農民的收入，而人往高處爬，水往低處流，故台灣的農業人口流到非農業部門的比例很高。因此，以客觀的職業社會經濟地位之高低階序去評定職業之高低，較符合實際情形。如果以職業聲望之高低做為職業之高低之評定基礎，由於農民之職業聲望，比許多藍領工人都高（文崇一，張曉春，1979；蔡淑鈴，廖正宏，黃大洲，1985；瞿海源，1985），但農民流出至藍領工人的情形，卻又非常普遍，因此，將會很難說明人往高處爬的實際現象。

在客觀職業地位之評定方面，通常都是以職業的平均收入和平均教育程度為評定之基礎(Duncan, 1961; Blau & Duncan, 1967; Featherman & Hauser, 1978)。本研究依據民國74年的將近三萬個樣本（29521）的「家庭收支暨個人所得分配調查」資料，求得各類職業的平均教育程度與平均收入，如表一。

由表一我們可以看出，各類職業的平均收入，依高低次序，分別是(1)行政及主管人員，(2)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3)監督及佐理人員，(4)買賣工作人員，(5)服務工作者，(6)工人，以及(7)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另一方面，各類職業的平均教育程度，由高而低，分別是(1)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2)監督及佐理人員，(3)行政及主管人員，(4)買賣工作人員，(5)服務工作人員，(6)工人，以及(7)農林漁狩獵工作者。二者的次序相當接近，主要的不同在於行政及主管人員的平均收入高於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而後者的平均教育程度高於前者。基於平均收入、權力以及中國人「學而優則仕」之考慮，本研究將行政及主管人員的職業地位，列在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之前。故本研究對客觀職業地位之評定，由高而低，依序是(1)行政及主管人員，(2)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3)監督及佐理人員，(4)買

表一 父子兩代職業的平均教育程度與平均收入

職業	教育程度之平均數	教育程度之標準差	收入之平均數(元)	收入之標準差(元)
1. 行政及主管人員	6.14	2.26	434672	236188
2. 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	7.93	1.40	321261	195260
3. 監督及佐理人員	6.77	1.56	236771	153891
4. 買賣工作人員	4.71	2.03	206698	194429
5. 服務工作者	4.42	1.96	174676	127827
6. 工人	4.28	1.63	161238	102520
7. 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	3.02	1.55	112318	110961

註：教育程度 10 表研究院(所) 9 一大學 8 一專科
 7 一高中 6 一高職 5 一初中、國中
 3 一國民小學 2 一補習、自修或私塾 1 一不識字
 4 一初職

賣工作人員，(5)服務工作者，(6)工人，以及(7)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

表二及表三為父子兩代職業的代間流動表，表二為流出表(out-flow table)，表三則是流入表(inflow table)。從表二我們首先可以看出，父子二代職業結構相當不一樣，在兒子這一代職業結構中，其各類職業所佔的百分比，比父親這一代有顯著增加者，計有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由 1.9 % 增為 4.6 %)，監督及佐理人員(由 5.9 % 增為 10.7 %)，買賣工作人員(由 11.9 % 增至 13.1 %)，以及工人(由 21.1 % 增至 50.5 %)。其中，以工人所增加的百分比最高，幾達 30 %。反之，在兒子這一代的職業結構中，其各類職業所佔的百分比，比父

親這一代有顯著減少者，計有行政及主管人員(由 4.3 % 減為 1.1 %)，以及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由 49.3 % 減為 14.9 %)。其中，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的降幅最大，幾達 35 %。另外，服務工作者在父子二代

表二 父子兩代職業的流出表 (%)

兒子職業 父親職業	行政及 主管 人	專門性 技術性 及有 關 人	監督及 理 人	買賣工 作 人	服 務 工 作 者	工 人	農林漁 牧狩獵 工作者	列 分 百 比
行政及 主管 人	7.9	9.6	40.4	14.9	0.9	23.7	2.6	100.0
專門性 技術性 及有 關 人	0.0	23.1	17.3	17.3	11.5	26.9	3.8	100.0
監督及 理 人	2.5	10.2	31.8	14.0	7.6	31.2	2.5	100.0
買賣工 作 人	1.3	6.0	14.2	39.3	4.1	31.1	4.1	100.0
服 務 工 作 者	0.0	5.3	12.6	14.6	19.2	47.0	1.3	100.0
工 人	0.9	3.9	8.2	9.8	4.3	68.6	4.4	100.0
農林漁 牧狩獵 工作者	0.5	2.7	5.3	7.6	4.0	53.5	26.4	100.0
行百分 比	1.1	4.6	10.7	13.1	5.2	50.5	14.9	100.0

表三 父子兩代職業的流入表 (%)

兒子職業 父親職業	行政及 主管 人	專門性 技術性 及有 關 人	監督及 理 人	買賣工 作 人	服 務 工 作 者	工 人	農林漁 牧狩獵 工作者	列 百 分 比
行政及 主管 人	31.0	8.9	16.1	4.9	0.7	2.0	0.8	4.3
專門性 技術性 及有 關 人	0.0	9.8	3.2	2.6	4.3	1.0	0.5	1.9
監督及 理 人	13.8	13.0	17.5	6.3	8.7	3.6	1.0	5.9
買賣工 作 人	13.8	15.4	15.8	35.7	9.4	7.3	3.3	11.9
服 務 工 作 者	0.0	6.5	6.7	6.3	21.0	5.3	0.5	5.7
工 人	17.2	17.9	16.1	15.7	17.4	28.6	6.3	21.1
農林漁 牧狩獵 工作者	24.1	28.5	24.6	28.6	38.4	52.1	87.7	49.3
行百分 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的職業結構上所佔的百分比，大致一樣(各為 5.9 % 以及 5.2 %)。由此可見，上一代的勞動力，以農業人口為主，幾佔總勞動力的一半，而下一代的勞動力，則以工人為主，也佔了一半左右。在父親的職業結構中，農民佔了一半，工人只佔五分之一左右；在兒子的職業結構中，工人佔了一半，而農民只佔 15 % 左右，顯示出台灣由農業社

會轉為工業社會的過程。

其次，就各類職業的代間流動與傳承的情形而言，讓我們依客觀職業地位之高低逐一討論。對角線上的職業佔列職業欄(即兒子職業結構)的百分比愈高，表示此類職業的不流動率愈高，即職業傳承的程度愈高，而代間流動愈低。就行政及主管人員而言，由於它是職業地位最高者，因此，其代間流動皆是向下流動，其比率高達 92.1%，主要是流至監督及佐理人員，而其地位傳承或不流動的比率，則只有 7.9%。在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方面，其地位傳承的比率為 23.1%，流動率則為 76.9%，而且都是向下流動，主要是流至工人，其次則是監督及佐理人員，以及買賣工作人員。在監督及佐理人員方面，其地位傳承的比率(31.8%)，比前二類都高；而流動率則為 68.2%，其中，向上流動率為 12.7%，主要是流至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向下流動率則為 55.3%，主要是流至工人。在買賣工作人員方面，其地位傳承的比率(39.3%)，又比前三者都高，顯示出買賣工作人員世代相傳，地位世襲的情形相當普遍；而其流動率則為 60.7%，其中向上流動率為 21.5%，主要是流至監督及佐理人員，向下流動率則為 39.2%，主要是流至工人。在服務工作者方面，其地位傳承的比率為 19.2%，顯示服務工作者世代相傳的情形並不普遍；另外，其流動率則高達 80.8%，其中向上流動率為 32.5%，主要是流至買賣工作人員與監督及佐理人員，向下流動率則為 48.3%，絕大多數是流至工人。在工人方面，其地位傳承的比率，高達 68.6%，而流動率則為 31.4%，大部份都是向上流動，主要是流至買賣工作人員與監督及佐理人員。最後，在客觀職業地位最低的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方面，其地位傳承的比率為 26.4%，而代間流動則都是向上流動，其比率為 73.6%，大部份都是流至工人職業。

故綜合而言，表二顯示，對角線上的職業佔兒子職業結構的百分比相當高者，計有監督及佐理人員(31.8%)，買賣工作人員(39.3%)

), 以及工人(68.6 %)。顯示出這三類職業的傳承程度較高。其中, 尤以工人的職業傳承程度特別高。換言之, 即工人的流動機會遠比其他職業為低。另外, 從表二我們也可看出每類職業流出到其他職業的程度。就流出率而言, 流出率較高者(即對角線上的職業佔兒子職業結構的百分比愈低者), 計有行政及主管人員(92.1 %, 即 1-7.9 %), 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76.9 %), 服務工作者(80.8 %), 以及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73.6 %)。這些職業的流出率, 都達 70 % 以上。這些流出者究竟是流至那些職業呢? 就行政及主管人員而言, 主要是流至監督及佐理人員, 而其他各類職業的流出者, 主要都是流至工人職業。其中, 尤以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流至工人的比率最高, 佔其本身流出人口的 73 % 左右, 幾達四分之三。至於工人本身的流出者, 主要是流至買賣工作人員。由此可見, 工人職業是各類職業流出者的最主要接收者。而行政及主管人員的流出率, 雖然最高, 但其最主要的接收者, 並非工人, 而是監督及佐理人員, 與其他職業的流出情形不一樣。

以上為就流出表所顯示出來的有關台灣代間社會流動之一些主要現象。另外, 就流入表而言, 首先, 讓我們檢視各類職業的自行補充(self-recruitment)程度, 即對角線上方格內的職業佔行職業欄(即父親職業結構) 的百分比。由表三我們可以看出, 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的自行補充程度最高, 高達 87.7 % 。換言之, 兒子為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 其父親幾乎也全是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 即很少有上一代為非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 下一代轉為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如單就農民而言, 其自行補充程度, 應是更高, 估計應達到 90 % 以上。除了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外, 自行補充程度較高的職業, 依次為買賣工作人員(35.7 %), 行政及主管人員(31.0 %), 及工人(28.6 %)。另外, 自行補充程度較低者, 依次為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9.8 %), 監督及佐理人員(17.5 %), 以及服務工作者(21.0 %)。

其次，就各類職業的主要供給者而言，表三顯示出，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買賣工作人員、以及行政及主管人員，其最主要的供給者，都是其自己本身，其次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另外，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監督及佐理人員、服務工作者、以及工人這些職業，其最主要的供給者，都是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其中，工人由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供給的程度，高達一半以上(52.1 %)。由此可見，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除了自行補充之外，還是其他職業的最主要供給者。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歸納出一些主要結論：

1. 一般而言，台灣的代間社會流動比率相當高，地位世襲情況並不嚴重。

2. 父子二代的職業結構相當不一樣，上一代以農業社會的職業結構為主，下一代則轉變成工業社會的職業結構特性。

3. 農民的自行補充程度最高，同時也是其他職業的最主要供給者。

4. 職業地位最高的行政及主管人員，其流出率雖然最高，但是其流出型態與其他職業不同；同時，其自行補充的程度，仍是相當高。

以上對流動表的分析，主要是以個別職業的百分比為主，去檢視兩代之間的職業流出與流入之主要特性。另外，如果我們欲以整體職業為分析對象，去檢視流動表上所顯示出來的特性，則有二組概念最常為社會流動研究者所採用。第一組概念為前述 Sorokin 所發展出來的向上流動(upward mobility)和向下流動(downward mobility)。第二組概念為結構性流動(structural mobility)與循環流動(circulation mobility)。讓我們先檢視台灣整體職業結構的向上流動和向下流動情形。

表二的對角線左下方的總數，除以樣本總數，就是向上流動率；對角線右上方的總數，除以樣本總數，就是向下流動率；二者合起來即為總流動率。另外，由於流動表上的父子兩代所包括的時間，長達數十年之久，故嚴格說來，並非真正的兩代，而只是起點(origin

)與終站(destination)的關係。因此，本研究依據兒子的年齡加以分組，以便更接近真正所謂的兩代，以及有更細的分組資料，所得到的結果如表四。

表四 父子兩代職業流動率的估計 (%)

兒子在民國 75 年之年齡	向上流動率	向下流動率	總流動率
20 — 24 歲	39.5	19.7	59.2
25 — 29 歲	49.9	16.2	65.9
30 — 34 歲	51.7	16.5	68.2
35 — 39 歲	52.6	14.3	66.9
40 歲以上	52.3	9.2	61.5
整體資料	47.1	17.0	64.1

附表一 民國 65 年父子兩代職業流動率的估計 (%)

民國 65 年兒子年齡	向上流動率	向下流動率	總流動率
20 —— 24 歲	36.1	19.7	55.8
25 —— 29 歲	40.0	17.8	57.8
30 —— 34 歲	34.6	16.8	51.4
35 —— 39 歲	27.3	14.1	41.4
40 歲以上	30.2	15.1	45.3
整體資料	36.6	18.2	54.8

表四告訴我們：不論是整體的資料，或者是各年齡組的分組資料，台灣地區的向上流動率，都遠高於向下流動率。就整體資料而言，向上流動率為 47.1 %，向下流動率只有 17.0 %。前者是後者的 2.8 倍。

至於整體流動率則高達 64.1 %，幾近三分之二。另外，就各年齡組的分組資料而言，兒子的年紀愈大，向上流動率愈高，而向下流動率則愈低。就兒子的年齡為 20 ~ 24 歲此一組而言，向上流動率是向下流動率的二倍，而 40 歲以上此年齡組，向上流動率高達向下流動率的 5.7 倍。不過，在這裡我們必須指出的是：表四各年齡組的比較，其實隱含代內流動的現象，因為照常理判斷，由於社會的進步，年紀愈輕，受工業昇級與結構變遷的機會應大於年紀大者。因此，應有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才是。而本研究中的年輕者之向上流動率所以較低，應係初就業者相當多，不如年紀大者已有二、三十年的工作經驗，故後者的向上流動率較大。而本研究因受資料限制，無法探討本人第一個職業與現在職業之間的代內流動情形。無論如何，台灣的向上流動率遠高於向下流動率，乃是不爭的事實，而其最主要原因，乃是由於農民的流出(尤其流出成爲工人)以及農民的客觀職業地位居於底層之故。從表二我們可以算出，由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流出至工人的比率，佔所有向上流動率之 60 % 左右。此種現象與台灣的職業結構變遷所導致的結構性流動密切相關，故底下本研究將討論此問題。

社會流動研究者在探討社會流動的原因或類型時，一個主要的關注點就是上述的第二組概念，即結構性流動與循環流動。如前面文獻探討部份所言，結構性流動通常指的是因職業結構變遷而引起的社會流動，例如一個社會在工業化過程當中，其農業所需的勞動力，必將愈來愈低，而多出來的農業人口，勢必非往農業以外的部門流出不可，故結構性流動亦稱爲強迫性流動(forced mobility)或最低限度流動(minimum mobility)；另一方面，循環流動通常指的是社會流動機會的開放程度，即此社會的地位世襲情形如何？它所重視的是社會流動機會的開放程度。循環流動率愈低，社會流動機會愈不開放，地位世襲情形愈高。例如在喀斯德制度(caste)之下，循環流動率不僅低，甚至於不可能。

至於在實際計算方面，結構性流動為父親的職業分配與兒子的職業分配的差異指數 (index of dissimilarity)，其計算公式為

$$\Delta(I. D.) = 1/2 \sum_{i=1}^n |x_i - y_i|$$

在此程式中，N 是職業類別總數， X_i 是父親的樣本依 N 種職業類別分配，所得的第 i 種職業之百分比； Y_i 是兒子的樣本依 N 種職業類別分配，所得到的第 i 種職業之百分比。此差異指數的意義是使父子二個職業分配的差異調整為完全一致時所需調整的分配額。至於循環流動率則為總流動率與結構流動率之差額。如本研究在前面文獻探討部份所言，以殘差項做循環流動的運作定義將使循環流動缺乏其本身的實質內涵。但是，在沒有更好的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辦法之前，本研究仍將採取此種一般的計算方式。依此計算方式所得到的結構性流動和循環流動的比率，如表五。

由表五我們可以看出有關台灣地區的結構性流動與循環流的二點主要現象：

第一、不論是整體資料，或者是各年齡組的資料，台灣的社會流

表五 父子兩代職業的結構性流動與循環流動 (%)

兒子在民國 75 年之年齡	結構性流動	循環流動	總流動率
20—24 歲	31.8	27.4	59.2
25—29 歲	39.0	26.9	65.9
30—34 歲	44.4	23.8	68.2
35—39 歲	45.7	21.2	66.9
40 歲以上	46.2	15.3	61.5
整體資料	38.1	26.0	64.1

附表二 民國 65 年父子二代職業的結構性流動與循環流動(%)

民國 65 年兒子年齡	結構性流動	循環流動	總流動率
20——24 歲	31.4	24.4	55.8
25——29 歲	31.2	26.6	57.8
30——34 歲	28.3	23.1	51.4
35——39 歲	27.3	14.1	41.4
40 歲以上	24.5	20.8	45.3
整體資料	29.3	25.5	54.8

動率相當高，約在三分之二左右。而且，結構性流動率高於循環流動率。就整體資料而言，結構性流動率是 38.1%，循環流動率是 26%。就各年齡組而言，各年齡組的年紀愈大，其結構性流動率高於循環流動率的差距，也就愈大。由此可見造成台灣地區社會流動的最主要原因，乃是職業結構的變遷。而在職業結構變遷所引起的結構性流動當中，如前所述，最重要的職業變遷乃是農業人口的減少，以及隨之引起的工人人口之增加。這二種職業的變遷所引起的結構性流動率，高達 31.9% (分別是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之變遷佔 17.2%，工人之變遷佔 14.7%)，佔結構性流動率的 84%，佔總流動率的 50%。這種情形也可以由父子二代職業的相關係數看出來。在整體資料中，父子二代職業的相關係數只有 0.43，在非農業的樣本裡，父子二代職業的相關係數只有 0.38。對於此二者的相關係數之差異原因，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由於農業人口移出至工人的情形，相當普遍，因此，促成了整體資料中的父子職業之相關係數的增加。

第二、就各年齡組而言，各年齡組的年紀愈大，其結構性流動率也就愈大，而循環流動率則愈小；反之，各年齡組的年紀愈小，其

循環流動率也就愈大，而結構性流動率則愈小。此是否顯示出台灣的結構性流動有減緩的趨向，而循環流動有增加的趨向，仍有待不同時期的比較分析加以驗證。

由於表四與表五的各種流動率(向上或向下，結構性或循環流動率)是社會學者建構出來的抽象概念，其數值本身較為抽象。為了使這些數字本身顯得更有意義，常用的方法是做各種比較研究，例如貫時性的(longitudinal)的比較研究，或者是各個社會的比較研究。也就是說，數字的本身並不會講話，可是，當透過比較之後，數字本身即顯得較有實質的意義，而非只是抽象而且空洞的數值。因此，本研究首先與10年前(民國65年)的台灣做比較。由表四與附表一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不論就整體的資料，或就各年齡組的資料而言，過去十年來，台灣的向上流動率顯著增加，向下流動率稍微減少，而總流動率因向上流動率的增加而隨之增加。就整體資料而言，民國75年的向上流動率，比民國65年增加了10.5%(0.471-0.366)，向下流動率下降了1.2%(0.182-0.170)，而總流動率則增加了9.3%(0.641-0.548)。

然而，由表五與附表二的比較中，我們也可看出：就整體資料而言，民國75年台灣的結構性流動率，比民國65年增加8.8%(0.381-0.293)，循環流動率基本上可說是維持不變，僅增加0.5%(0.260-0.255)。由此可見台灣十年來總流動率的增加，主要是社會結構變遷所導致的結果，而非流動機會的更為開放。事實上，流動機會基本上維持不變，約在四分之一左右。

另外，就與其他社會的比較而言，如果與美國社會相比而言，Featherman與Hauser(1978: 93)的研究指出：如果以五類職業的流動率為準，1973年美國社會的總流動率為0.681，其中，向上流動率為0.509，向下流動率為0.172；另外，其結構性流動率為0.188，循環流動率為0.493。可見美國社會的總流動率比台灣稍微高些，高

出 4 % (0.681-0.641)，主要原因是美國的向上流動率比台灣略高(分別是 0.509 與 0.471)，而向下流動則相當接近(分別是 0.172 與 0.170)。此外，就結構性流動與循環流動此一組概念而言，美國的循環流動率比台灣高出 23 % (0.493-0.260)，而台灣的結構變遷率則比美國高出約 19 % (0.381-0.188)。因此，就此一組概念所顯示出來的意義而言，美國社會的流動機會比台灣更為開放，而台灣因社會結構變遷所導致的社會流動程度，比美國為高。

最後，如果我們想探討父子二代職業的基本關聯型態，我們得藉助於各種統計方法對流動資料的分析。如前面文獻探討部份所言，這些統計分析方法相當多。本研究將以飽和對數線性模型 (saturated loglinear model) 的乘數參數 (multiplicative parameters)，探討父子二代職業流動的基本關聯型態。社會流動研究者對代間流動型態的探討方向，相當廣泛。其中，一般社會學者較感興趣者，主要有地位世襲 (the inheritance of status)，階級藩籬 (class boundary)，以及職業補充與供給 (occupational recruitment and supply) 等方面。底下，本研究將就此三方面加以探討。

首先，讓我們檢視父子二代的地位世襲型態。本研究對此問題的探討，將集中在職業傳承方面。表六對角線方格內的乘數係數值愈高，代表職業傳承的傾向愈高。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客觀職業地位高低階序的首尾兩端者，其職業傳承的傾向愈高，而在中間者，其職業傳承傾向較低。詳言之，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的職業傳承傾向最高，其數值高達 66.69，意即父親是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其兒子成為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的可能性，或優勢比 (odds)，將比父親非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其兒子成為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的可能性，增加 66.69 倍；其次則是行政及主管人員 (36.60)；而最低者則是監督及佐理人員 (2.89)。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的職業傳承傾向是監督及佐理人員的 23 倍左右。在此職業傳承型態中，比較顯著的例外是居於客觀

職業地位階序之中間的服務工作者，其職業傳承的傾向也相當（19.69），居第三位。另外，我們還可以比較各類職業的傳承與流動傾向之差距倍數。例如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的兒子，成為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的可能性，是成為行政及主管人員的可能性之222倍（66.69除以0.3）；行政及主管人員的兒子，成為行政及主管人員的可能性，是成為工人的可能性之108倍左右（36.60除以0.34）；而工人的兒子成為工人的可能性，是成為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之可能性的10.3倍左右（4.95除以0.48）。最後，我們還可以看出，大致而言，居客觀職業地位階序最底層的服務工作者、工人、以及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其離開對角線的距離愈遠的各類職業對數係值愈低，表示此三類職業的長距離流動，愈遠愈不可能；而居客觀職業地位階序較高的其他四類職業，其離開對角線的距離愈遠的各類職業的對數係數值，並非一定就愈低，表示長距離的流動可能性，並非就是愈遠愈不可能。

接著，讓我們檢視階級藩籬問題。經驗研究取向的新韋伯研究者（例如，Vanneman，1977；Gagliani，1981；Breiger，1981；Snipp，1985），對於階級的界定以及對階級結構的探討，所注重的是各階級之間的市場情況（market situation），（例如收入、工作環境、升遷管道等等）和生活方式（life styles）是否有顯著的差異。這些經驗研究的理論背景，很明顯地是受Weber（1978），和新韋伯學者，例如Parkin（1971）和Giddens（1973）等人的影響。這些人對階級結構的經驗研究之主要結論，綜合起來，主要有三：(1)務農者與非務農者之差異；(2)白領階級與低層白領階級之差異，以及(3)白領階級與藍領階級之差異。例如，Snipp（1985）的研究指出，如果以職業生涯流動（career mobility）型態做階級界限的區分標準，則美國的階級結構，可以粗略劃分為農民階級、藍領階級和白領階級。另外，在Blau與Duncan（1967:78）的實証研究裡，他們認為美國社會有三大階級藩籬，此三大階級藩籬把美國社會分成

表六 以飽和對數線性模型的乘數參數求得的職業流動率

兒子職業 父親職業	行政及 主管 人 員	專門性 技術性 及有 關 人 員	監督及 佐理 人 員	買賣工 作人 員	服 務 工 作 者	工 人	農林漁 牧狩獵 工作 者
行政及 主管 人 員	36.60	1.68	6.17	0.87	0.02	0.34	0.37
專 門 性 技 術 性 及 有 關 人 員	0.39	6.82	0.82	0.85	3.00	0.31	0.57
監 督 及 佐 理 人 員	2.83	1.38	2.89	0.57	1.38	0.44	0.26
買 賣 工 作 人 員	0.96	0.67	0.78	6.30	0.55	0.61	0.94
服 務 工 作 者	0.11	0.87	1.02	1.43	19.69	2.27	0.16
工 人	0.80	0.48	0.44	0.66	1.00	4.95	1.82
農 林 漁 牧 狩 獵 工 作 者	0.30	0.23	0.19	0.40	0.92	3.13	66.69

三大階級，即白領、藍領與農民階級。每一階級藩籬限制代內與代間的向下流動，而向上流動則在向上流動機會過剩下，加以准許。雖然 Featherman & Hauser (1978:177-179) 的實証研究，大部份否定或修正 Blau & Duncan 的看法。但是，階級藩籬的問題，不論是 Newberry 學者，或是新馬克斯主義者，都一直是相當有興趣，但又爭執不休的問題。因此，讓我們也來看看台灣地區的階級藩籬情形。首先，

就農民與工人之間的階級藩籬而言，農民的兒子成為工人的可能性（3.13）以及工人的兒子成為農民的可能性（1.82），都比流出至其他職業的可能性高。因此，就此點而言，農民與工人之間的藩籬並不存在。不過，農民的兒子成為工人的可能性，高於工人的兒子成為農民的可能性。另外，就白領與藍領的階級藩籬而言，我們由表六可以看出，工人的兒子成為行政及主管人員，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以及監督及佐理人員的優勢比（分別是 0.80，0.48，0.44），都相當低；反過來而言，行政及主管人員，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以及監督及佐理人員的兒子，成為工人的優勢比，也相當低（分別是 0.34，0.31 與 0.44）；除此之外，就白領與農民階級的藩籬而言，農民的兒子成為行政及主管人員，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以及監督及佐理人員的優勢比（分別是 0.30，0.23 與 0.19），都相當低，而行政及主管人員，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以及監督及佐理人員的兒子成為農人的優勢比（分別是 0.37，0.57 與 0.26），也都相當低。因此，台灣地區的白領階級與藍領階級或農民階級之間，似乎有一藩籬存在，不易攀越而過。

另外，就白領階級的彼此流動而言，從表六我們也可以看出，行政及主管人員的代間流動，主要是向下流至監督及佐理人員，而非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此與本研究前面的發現一樣。至於監督及佐理人員的代間流動，主要是流至行政及主管人員，而不是流至專門性、技術性及有關人員。但是監督及佐理人員的兒子流至行政及主管人員的優勢比（2.83），低於行政及主管人員的兒子流至監督及佐理人員的優勢比（6.17），後者是前者的 2.2 倍左右，顯示出二者之間的向下流動傾向，高於向上流動傾向。

最後，就職業的補充與供給而言，首先，我們從表六的列職業欄可以看出，各類職業的自行供給傾向都高於供給其他類之傾向。這種情形在職業傳承傾向特別高的行政及主管人員，服務工作者，以及農

林漁牧狩獵工作者之間，尤其顯著。另外，從行職業欄而言，即在各類職業的補充傾向方面，以自行補充的可能性最高，而且，除了監督及佐理人員之外，各類職業自行補充(self-recruitment)的可能性，都高於從其他類職業得到補充的可能性；而在監督及佐理人員方面，則以從行政及主管人員得到補充的可能性最高。

肆、結 論

本研究利用主計處的民國 75 年「台灣地區家庭收支暨個人所得分配調查」內的二代職業資料，做流動表的分析，以便初步探索台灣代間社會流動的一些基本情形。所得到的主要結果如下：

1. 整體而言，台灣的代間社會流動比率相當高，約在三分之二左右，顯示地位世襲情況並不嚴重。故就此意義而言，台灣社會較接近開放社會，而非閉塞社會，此應是國人所樂見的現象。但是，本研究也發現，台灣的職業傳承或地位世襲情形，在不同的職業裡，其情形也不同。具體而言，行政及主管人員，服務工作者，以及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的職業傳承傾向較高；另外，工人的流動機會也比其他職業為低。故台灣社會的開放程度，較接近有限度的開放，而非完全的開放。

2. 台灣的向上流動率高於向下流動率，前者是後者的 2.8 倍左右，而其主因乃是農民的大量流出以及農民居於客觀職業地位的底層之故。

3. 形成前述二種情形的主要原因，乃是職業結構變遷所引起的結構性流動。而最主要的職業結構變遷乃是農業人口的減少，以及隨之引起的工人人口之增加。這二種職業的變遷所引起的流動，佔結構性流動率的 84 %，佔總流動率的 50 %。此外，就與循環流動相比而言，台灣的結構性流動率高於循環流動率。

4. 就職業傳承傾向而言，農林漁牧狩獵工作者的傳承傾向最高，

其次是行政及主管人員，而最低者則是監督及佐理人員。

5. 就階級藩籬而言，農民與工人之間並無藩籬存在。但是，白領階級與藍領階級或農民之間，則有一道藩籬存在，不易攀越而過。

6. 就職業的補充與供給而言，各類職業的自行供給傾向，都高於供給其他職業的傾向；而且除了監督及佐理人員之外，各類職業自行補充的可能性，也都高於從其他類職業得到補充的可能性。

在資料方面，由於國內有關二代的資料，相當缺乏。即使有二代的資料，也是不健全，不一定適合做代間社會流動之分析。本文研究者衷心希望學術機關在做大規模的社會調查時，能把二代的基本背景調查加進去，以便利研究者做有關二代的種種社會現象之分析。

在未來的代間社會流動之研究方面，本研究者希望能夠針對台灣社會流動的情形，發展出可能適合的一些社會流動模型，並做模型檢定工作；另外，本研究者也希望能夠就不同年代的資料，探討台灣社會流動的趨勢，例如整體流動率是否繼續增加？向上流動率與向下流動率之差距是否在擴大、縮小，或維持不變？結構性流動是否逐漸緩和下來？流動機會是否增加等等？以期能對台灣的社會流動現象，做更進一步的瞭解。

參考資料

文崇一、張曉春

1979 「職業聲望與職業對社會的實用性」，台灣人力資源會議報告，頁 263-675。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許嘉猷

1986 「美國的地位取得研究及其意義」，美國社會狀況專題報告，頁 29-61。台北：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

蔡淑鈴、廖正宏、黃大洲

1985 「從社會階層化觀點論農民階級」，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

所：第四次社會科學會議論文。

瞿海源

- 1985 「台灣地區職業地位主觀測量之研究」，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第四次社會科學會議論文。

蔡淑鈴

- 1987 「職業隔離現象與教育成就：性別之比較分析」，*中國社會學刊*，11(春)：61 - 91。

蔡淑鈴、文崇一

- 1985 「性別與社會流動：台灣之實徵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0(秋)：121 - 147。

Breiger, R.

- 1981 "The Social Class Structure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578-611.

Blau, Peter M. and Otis Dudley Duncan

-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Wiley.

Deming, W.E. and F.F. Stephan

- 1940 "On a Least-squares Adjustment of a Sampled Frequency Table when the Expected Marginal Totals are Known," *Annal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11: 427-44.

Duncan, O.D.

- 1961 "A Socioeconomic Index for all Occupations," pp. 109-138 in *A.J. Reiss, Jr., (ed.) Occupations and Social Status*, New York: Free Press.

- 1979 "How Destination Depends on Origin in the Square Mobility Tabl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793-803.

Erikson, R. and J.H. Goldthorpe

- 1985 "Are American Rates of Social Mobility Exceptionally High?"

- New evidence on an old questio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 (1):1-15.
- Featherman, D.L. and R.M. Hauser
 1978 *Opportunity and Chan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agliani, G.
 1981 "How Many Working Class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2):250-285.
- Giddens, Anthony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Glass, D. B.
 1954 *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Goodman, Leo A.
 1969a "How to Ransack Social Mobility Tables and Other Kinds of Cross-classification Tabl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5 (July):1-39.
 1972c "Some Multiplicative Models for the Analysis of Cross-classified Data," pp.649-696 in *Proceedings of Sixth Berkeley Symposium on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rusky, D. B. and R. M. Hauser
 1984 "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Revisited: Models of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16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February):19-38.
- Haug, M. R.
 1977 "Measurement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51-77.

Hauser, R.M., et. al.

1975a "Temporal Changes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Evidence for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 (June) :279-97.

1975b "Structrual Changes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ong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 (October) :585-98.

Hout, M.

1988 "More Universalism, Less Structural Mobility: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rue in the 1980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May) :1358-400.

Kahl, J.A.

1957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Lipset, S. M. and R. Bendix

1959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iller, S. M.

1961 "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Current Sociology*, 9:81-89.

Mosteller, F.

1968 "Association and Estimation in Contingency Tabl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63 (March) : 1-28.

Parkin, Frank

1971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apitalist and Communist Societies*, New York : Praeger.

Portocarero, L.

- 1983 "Social Fluidity in France and Sweden," *Acta Sociologica*, 26:127-139.
- Rogoff, Natalie
- 1953 *Recent Trends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Glencoe, Illinois : Free Press.
- Snipp, C. M.
- 1985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Social Class: Insights from Men's Career Mob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475-493.
- Sobel, M. E.
- 1983 "Structural Mobility, Circulation Mobility, and the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a conceptual mismat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721-727.
- Sobel, M. E., M. Hout and O. D. Duncan
- 1985 "Exchange, Structure, and Symmetry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59-72.
- 1986 "Saving the Bath Water: an Invited Comment on Krauze and Slomczynske's 'Matrix Representation of structural and Circulation Mobility,'"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14:271-284.
- Sorokin, P.A.
- 1927 *Social and Cultural Mobi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Vanneman, R.
- 1977 "The Occupational Composition of American Classes: results from Cluster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January) :783-807.
- Weber, Max.

- 1978 "Status Groups and Classes," pp.302-307 in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ed.),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aiwan : Mobility Tables Analysis

Jia-you Sheu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data from DGBS' "Survey of Taiwan's Families Expenditures and Individuals Income Distribution" (1986), this study analysis some mobility tabl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aiwan.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On the whole, the total mobility rate in Taiwan is approximately $2/3$. This means that the inheritance of status in Taiwan is not a serious problem, hence, Taiwan is closer to an open society, rather than to a closed society.

2. The upward mobility rate is higher than downward mobility rate in Taiwan. The former is about 2.8 times of the latter. The major reasons in explaining this are that a large number of farmers outflow to other occupations and the farmers are at the bottom of the occupations hierarchies.

3. The major reason in explaining 1 and 2 is the large amount of structural mobility which was the result of changes of the occupa-

tional structure in Taiwan.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of the occupational changes is the decrease of the farmers and the subsequent increase of the workers. The mobility rate caused by this factor accounts for 84% of the structural mobility rate, and 50% of the total mobility rate in Taiwan.

4. Th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has the highest propensity of occupational inheritance, next is the administrative and managerials, and the clerical and related workers show the lowest propensity of occupational inheritance.

5. With regard to the problem of class boundaries, among occupations there exists no boundary between the farmers and the workers. However, there exist boundaries between the white collars and the blue collars, and between the white collars and the farmers.

6. With regard to the occupational supply and recruitment, the tendency of self-recruitment is higher than that of supplying other occupations among all occupations.